

核心提示

她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,今年90岁。是什么塑造了她始终坚韧的性格,使她饱经沧桑却依然乐观?回顾自己的人生,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说,一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:第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,第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和文学研究,第三是选择了老伴汤一介。



1931年,乐黛云出生在美丽的山城贵阳。她的父母都是新派人,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,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。他们家附近没有小学,父母就自己教她念书。父亲教英语、算术,母亲教语文和写字。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,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。

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后,他们一家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。父亲买了一小片地,就地取材,依山傍水,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房子,走下七层台阶,是一片宽阔的草地,周围镶着石板小路,路和草地之间,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。跨过草地,是一道矮矮的石墙,墙外是一片菜地,然后是篱笆。篱笆外就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。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,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。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交界之处,有一间木

韩羽跟贾大山很熟悉,他们一起开河北政协常委会,一年要开五次。一开政协,贾大山就打电话:韩老师,你去不去?你去我也去。

韩羽说,贾大山挺好玩,喜怒不形于色。有一次他去找贾大山,见贾大山正坐在床沿上捧着本书,是韩羽送的《杂烩集》。正读《毛论评》,是韩羽以儿童口吻评论丰子恺的儿童漫画,其中有两句话,韩羽自己都极为得意。瞅着贾大山读了一遍又翻回去再读一遍,洋洋自得,单等他叫一声好。可是贾大山把书本阖上了,无动于衷。韩羽有点悻悻然,暗自思忖莫非被窥出心思?“真会作态。”韩羽这么说,却仍对贾大山评价很高。他认为,贾大山很有才气,尤其在短篇小说上,不但在河北,在全国都是拔头筹的。两人如此交好,韩羽给贾大山的漫画像却只画了背影。河北文学刊物《长城》约韩羽画几幅河北作家的漫画像,有徐光耀、铁凝、贾大山。上世纪80年代《文艺报》上发表过韩羽画的徐光耀、铁凝的漫画像,至于贾大山,他闭着眼都能想出贾大山的模样,觉得随时都能将他“拘来笔下”。不仅要肖其形,传其神,还要兼及其趣。没想到要求过高,反而坏事,韩羽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,神形俱无。编辑催稿了,不画不行,没了辙,只好画了一个贾大山的背影。

韩羽写了几句话:“贾大山自甘寂寞,埋头写作,不喜出头露面,只画背影,意在颂彼之长;我本画技不高,难得肖似,只画背影,实为避己之短。”贾大山看到后问韩羽:“你不欲我以真相示人么?”韩羽当然不以实情相告,说:“不闻金圣叹批《西厢记》么?观如来者,不见顶相,正是如来顶相也。”

“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按照我的意愿搞美术创作。”非科班出身的韩羽调侃自己是美术界

的“散兵游勇”。是人民的哺育,传统文化的滋养,艺界师友的帮助,使他这个满头高粱花的农村小子,挤到美术队伍里来。“至今日,虽颠颠困苦,仍未掉队,依然老兵。”

90岁的韩羽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。在他看来,美术创作需要具备三个条件:一是需要绘画技术,就是画什么必须像什么。这个不能含糊;二是有生活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强调生活,艺术要高于生活,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可是,同样生活中的事,有人看得深刻,有人看得浮浅;有人观察面容,有人观察面宽。只有深刻的认识,才是真正有生活的作品;三是绘画语言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怎样通过画笔把从生活中观察认识的结论表现出来,这个很难。这三点都过硬了,才能有画说出好画。

掌握绘画语言非易事,韩羽却自有诀窍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要创作一幅表现到处大丰收的画。韩羽说:“‘大丰收’好画,难在‘到处’二字。我画了一个农户的大门口,从门里看门外是遍地庄稼,从门外看门里是满院子瓜果。这就算切题了。”

无论读书还是绘画,韩羽特别善琢磨。他说,开个小饭馆,还要琢磨老百姓爱吃哪一口呢,不琢磨怎么推销?韩羽觉得,画者和读者互相影响,才能水涨船高。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观众的参与创造,两者是合作关系。比如人的两条腿,作者是一条腿,观众是一条腿,一齐用力,才能迈步。如果无视观众,只剩下一条腿,靠蹦,又能蹦得了多远?

韩羽的作品,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很多营养,包括《世说新语》《聊斋志异》《红楼梦》等,也从俄罗斯文学中受益很多——他喜欢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也喜欢普希金的《上尉的女儿》

乐黛云： 愿把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

结构的小小的厕所,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白的大白石。少年时的乐黛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,用上厕所作掩护,读父母不愿意她读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。

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,乐黛云快乐地度过了初中时代。在老师的熏陶下,乐黛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,爱上了戏剧。

1952年,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了。公公是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“哈佛三杰”的汤用彤先生。乐黛云回忆说,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,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,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。汤用彤先生晚年患有脑溢血,乐黛云帮他做了很多事情,找书、听他口述,然后笔录成书。有一次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提到《诗经》中的一句诗:“谁生厉阶,至今为梗。”乐黛云没有读过,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,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汤老先生很惊讶,连说,《诗经》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?连《诗经》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,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?

这件事令乐黛云惭愧万分,从此发奋背诵《诗经》。她说,“五四时期”向西方学习的人,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,像吴宓、陈寅恪、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锺书、宗白华、朱光潜等,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,应向西方索取什么,而不是“跟着走”。

和同时代的学者一样,乐黛云也曾经历过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,她当过猪倌、伙夫、赶驴人、打砖手,也学会了耕地、播种、收割。她曾赶着四只小猪满山遍野寻食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她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,也经常思前想后,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,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,从事体力劳动,自食其力。想来想去,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:随遇而安,自得其乐。她说:“我似乎想明白了,倒也心安理得,每天赶着小猪,或引吭高歌,长啸于山林,或练英语,背单词于田野。”由于乐黛云劳动得很不错,还获得了“打砖能手”“插稻先锋”等称号,回校后,她被告知可以重返“神圣的讲坛”,给留学生上课。上世纪80年代起,她陆续发表和出版了《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》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》等作品,编译了《国外鲁迅研究论集》,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,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空间。

乐黛云说,“听其自然”是自己的格言。她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,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讲,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。“我觉得我做人也好、做事也好,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听其自然。”

据《新民晚报》舒晋瑜/文



韩羽： 美术创作是最幸福的事

等。韩羽读书杂乱,见什么读什么。

韩羽喜欢读书,从小“听书”成瘾。五六岁时他曾看中一册小唱本,要两个铜板,但他仅有一个铜板,摆摊的常信不卖。韩羽就蹲在唱本面前不走,直到晌午,常信被他感动,少要一个铜板,把书卖给他了。17岁时,看到丁聪画的《阿Q正传》,喜欢极了,节衣缩食买了来。他的《闲话家珍》一文,详细讲述了他买书、淘书甚至是“窃书”的经历,他对书的喜爱都到了“癖”的程度。比如,他从书店买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《契诃夫小说集》上下两卷,可下卷书脊发现斑痕,心里腻烦,就又买回一本下卷,却发现皱褶甚多,便再买回一本下卷。因读书多,不仅他的画耐人寻味,文章也多有雅趣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林苑青/文

纪实

试想一下,一个54万人口的大县,3400多名武汉返平遥人员,80多万欢度“平遥中国年”的中外游客,还有1.3万余名在太原、榆次从事出租车、家政等服务行业的平遥人,人流不可谓不大,情况不可谓不复杂,防控措施如果失当,后果不堪设想,但在平遥人的词典里没有“如果”,而奇迹于他们早已习以为常!

王晔星见到平遥县委书记武晓花时,她总在反反复复强调一句话:“疫情不能出平遥,疫情不能出平遥……”武晓花作风泼辣,工作扎实,“辨证施治”能力强,她把做什么、谁去做、怎么做、何时完成、责任人是谁等,开处方一般具体化、清单化,任务清晰、责任明

晰。为最大限度防止疫情扩散,平遥果断封村212个、封小区159个、封户1443户、封路1664条;果断关停餐饮业2396家、旅馆915家、洗浴23家、酒吧51家、棋牌馆349家、网吧15家、健身馆122家、电影放映馆3家;同时设立卡口518个,抽调公安、交警、交通、卫健、疾控等部门人员24小时严防死守。平遥以旅游业为生,采取如此断然措施,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,但晋商的后人从来只算大账,不计小账。平遥“舍我其谁”的大无畏气概和牺牲精神令人敬佩,晋中市委书记赵建平用一连串“最”给予高度评价:“平遥用最强硬的措施响应,最广泛的宣传唤醒,最严密的办法清底,最果断的措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7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隔离,最有力的手段保障,最严明的纪律跟进,最坚强的堡垒支撑,守住了平遥阵地,打赢了平遥疫情防控阻击战!”

离开平遥、太谷,吴伟一行又去了晋中市传染病医院。结束晋中调研返回太原时,接到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电话,刚收治了一位危重病人,姓姚,86岁。

连载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37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父亲不知怎样度过那几个日日夜夜,他肯定经历了无数次锥心刺骨的自责。那一份丢人,那一份羞辱,是他后半生灵魂深处的千斤重压。

面对儿女,父亲从来不提这一回事。父亲也以为我们不知道。其实早在幼年,从乡邻面对我的窃窃私语,从他们背后的指指点点,我早已明白

了什么。他们在压低声音说什么,为什么我一走来,他们就不说了。到我长大成人,更加明白,那个饥饿年代,我们的家里,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。

可怜的父亲。他把一个污名一直背负了几十年。顺存叔下狠手死整社员偷拿,是出于公心、热爱集体吗?是正直无私,主张公道吗?后来的事情说明,根本不是这样。

1960年的生产队,顺存叔才是当之无愧的偷盗主谋。队长、记工员、保管,这一伙队干,是生产队最大的偷盗集团。

顺存叔游手好闲,社员下地苦干,他从来不劳动,骑着自行车在各个地块转悠,说得好听叫“检查生产”。开会讲话,吆五喝六,把社员训得不敢

吱声,要够了威风。

三年困难时期,全队社员都挨饿,顺存叔和一帮队干,倒是吃饱喝足,油水不断。社员家家面有菜色,顺存叔一家却关住门在家里炸油坨坨(一种白面饼)。

谁家能吃到炒菜?这个时候,路过顺存叔家门口,听得吱啦一声,接着炒菜的香味飘出来,路人莫不停下脚步,交换眼色,那当然是看在眼里,恨在心上。顺存叔和队长、保管偷生产队的粮食私分,这样的故事多了。

队下的粮库就设在顺存叔的大院子里。一天他们几人大定圈套,队长带领大家上地,家家不准留人,顺存叔在巷里督促社员出发。待巷子里空了,三人动手。

随笔